

移民

中国对澳大利亚投资移民: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

颜廷

(江苏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华侨华人研究中心, 江苏 徐州 221116)

[摘要] 中国对澳大利亚投资移民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且直至90年代中期一直以香港、台湾商业投资移民为主。而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持续深入,经济持续腾飞,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直至新世纪初中国大陆对澳投资移民逐渐成为对中国对澳投资移民主流群体。尤其是近十余年中国大陆新兴富裕阶层的兴起,进一步巩固了中国投资移民在澳大利亚海外投资移民中的主导性地位,这对促进中国对澳经济合作交流,推动中澳关系长远发展影响深远。然而,由于当前澳大利亚主流社会开始质疑华人政治忠诚,并倾向于否认投资移民之于澳大利亚的经济价值和意义,使得未来中国对澳投资移民发展趋势不太乐观。

[关键词] 中国; 澳大利亚; 投资移民

[中图分类号] D76.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925(2022)03-0051-11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当代国际人口迁移流动越来越频繁,使得目前全球移民人口存量已高达2.8亿^①。这其中,投资移民是比较特殊的群体。与一般移民不同,投资移民不仅意味着技术与管理人才的国际迁移,还代表着私人财富在全球范围内的跨国流动,更直观地揭示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积极顺应全球化发展潮流,努力推进和深化改革开放,这一方面有力地推动了经济与社会的持续繁荣和发展,使得中国快速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另一方面亦培育了数量颇为可观的新兴富裕阶层,催生了连绵不断的对外投资移民潮,不断地加强着中国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社会联系,从而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企业和投资走出去提供了可资依托的桥梁和纽带。也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系统考察与研究中国海外投资移民问题十分必要。而作为西方发达国家阵营重要成员,澳大利亚一直是中国投资移民主要目的地国家之一,同时亦是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重要贸易伙伴国和“海上丝绸之路”南延线上最重要的节点国家,新世纪初以来接纳了大量中国投资移民,这对于中国利用、发挥对澳投资移民作用,加强中澳经贸交流与合作,推动南太平洋地区“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价值。故而,系统考察和研究中国对澳投资移民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这对管窥中国海外投资移民问题整体状况,具有比

[收稿日期] 2021-10-05, **[修回日期]** 2022-03-21

[作者简介] 颜廷,江苏东海人,江苏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华侨华人研究中心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澳大利亚史、华侨华人。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国际人才竞争视角下的海外华人新移民回流研究”(项目编号:16BRK0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2020 Highlights, New York, 2020, p.45.

较重要的参考意义。然而,对于相关问题研究,国内学界关注甚少,除少数研究成果偶有涉及,几乎没有专门研究成果^①。这便使得当前关于中国对澳投资移民问题展开更为系统而专门的研究尤为必要。

一、中国对澳投资移民历史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对澳大利亚投资移民^②历史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

(一)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对澳投资移民的开端

中国对澳投资移民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香港、台湾对澳商业投资移民。经过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快速发展,这一时期香港和台湾已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成为东亚经济火车头。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对外经贸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人们国际视野不断扩大,香港、台湾两地人民越来越羡慕西方发达国家更加民主、自由、富裕的生活方式,从而渴望移民。恰于此时,澳大利亚宣布放弃种族歧视政策,实施多元文化政策,这为两地人民对澳移民打开了方便之门。只是这一时期香港、台湾对外移民数量尚偏少,1975—1976年度香港对澳移民仅897人,台湾仅32人;直至1982—1983年度,香港、台湾对澳移民亦仅分别增至1369人、122人^③。加之澳大利亚于1978年才首开商业投资移民计划,这使得香港、台湾对澳移民中,其投资移民数量自然更少得多。这一时期,内地刚刚启动改革开放,经济比较落后,加之政策对人口流动限制较大,除极少量对澳亲属移民之外,几无投资移民。

(二)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香港、台湾商业移民为主导时期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经济的腾飞,香港、台湾等地以中小企业主、中高级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为代表的中产阶级发展壮大,这些人大多有良好的教育背景、英语能力及较广阔的国际视野,对外移民冲动比较强烈。而此时恰值澳大利亚谋求经济转型,欲将倚赖矿业繁荣的传统发展模式,转向依靠高新技术产业驱动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激发了对高级管理、技术人才的大量需求,且因其将希望寄托在对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韩国等亚洲新兴国家和地区的人才引进上,认为这些亚洲移民企业家、职业经理人和专业技术人才能够帮澳大利亚打造各类高新技术产业,并将相关产品销往日渐繁荣的亚洲市场^④,从而为香港人和台湾人以商业投资方式移民澳大利亚提供了巨大便利。这一时期,澳商业投资移民签证发放数量从1983—1984年度的1453人^⑤迅速增至1987—1988年度的7387人^⑥,其中来自香港、台湾两地的投资移民占了很大比例。据统计,从1982年7月至1990年3月,澳投资移民人口中,来自香港者占32.29%,来自台湾者占15.33%^⑦,两地对澳投资移民占比接近一半,从而形成了以香港、台湾为主导的中国

^①目前仅有张秋生的《试评陆克文-吉拉德政府的移民政策改革及其对华人新移民的影响(2007—2013)》,《八桂侨刊》2015年第3期、颜廷的《移民与回流:近十余年澳大利亚华人与印度人跨国人口迁移比较研究——国际人力资源竞争的视角》(《南亚研究》2016年第1期)、张玉洁和颜廷的《近十年澳大利亚移民人口结构变迁及影响》(《华侨华人研究》2018年第6期)等数篇论文,以及何河的《澳大利亚移民政策演进及其对经济的影响研究》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和张玉洁的《多元文化视角下澳大利亚移民人口结构变迁研究(1972—2016)》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等相关成果稍有涉及,却非专门研究。余者则绝大多数为资讯介绍类或知识普及类文章,很难谈得上是学术研究。

^②这里的中国投资移民,包含内地、香港和台湾两岸三地投资移民。

^③Department of Home Affairs, Australian Government, Historical Migration Statistics,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18. 见其中的“1.3 Settler arrivals, 1975-76 to 1994-95”数据模块。

^④Bob Birrell, “Immigration Policy in Australia”, in John Higley, etc., Nations of Immigrants Australia and the USA Compared, Cheltham, UK: Edward Elgar, 2010, p.73.

^⑤Alan Cadman M.P., Shadow Minister for Immigration & Ethnic Affairs, Immigration Programme, 1986/87, Canberra: 10 April, 1986.

^⑥The Hon. Clyde Holding, M.P., Minister for Immigration, Local Government and Ethnic Affairs, 1987-88 Migration Program Outcome Reflects Government's Policy on Economic Migration 98/88, MPS 98/88. Canberra: 25 August 1988.

^⑦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Parliamentary Deb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fficial Hansard No. 179, Thursday, 5 September 1991: 719.

对澳投资移民潮。而同一时期,中国内地仍鲜有投资移民来澳,以 1987—1988 年为例,当年来自中国内地的投资移民仅 12 例^①。事实上,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香港、台湾都是澳投资移民最重要的来源地。以 1994—1995 年度为例,澳大利亚排名前五的投资移民来源地分别是中国香港(27%)、印度尼西亚(19%)、中国台湾(16%)、南非(11%)和马来西亚(7%)^②。港台两地投资移民人口占比仍高达 43%,而中国内地投资移民仍较为少见。

(三)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至今:中国内地商业移民为主导时期

1990 年代,澳大利亚经济下行严重,失业率一度高达 11%^③,促使公众质疑商业投资移民计划的意义,认为其只是方便了拥有商业技艺和资本的人移民到澳大利亚^④,从而迫使工党基廷政府不得不大幅缩减商业投资移民,1994—1995 年度甚至仅发放了 2 400 张签证^⑤,这直接导致香港、台湾投资移民量大不如前。之后联盟党霍华德政府再度扩大商业投资移民计划,使得 2001—2002 年度重回至 7 590 人的历史高水平^⑥,香港、台湾对澳移民冲动却已疲软,难回之前的巅峰状态。主要原因在于,当时澳大利亚整体经济环境欠佳,香港、台湾经济则持续向好,尤其是香港人均 GDP 从 1988 年的 1.07 万美元暴增至 1997 年的 2.73 万美元^⑦,远超澳大利亚,大大削弱了人们移民动力,使得香港对澳技术移民人口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高峰时期每年一万多人,降至新世纪初仅千余人左右^⑧。这其中商业投资移民所占份额则更少。而与香港、台湾情况相反,新世纪初以来中国内地经济迅速起飞,激发了人们移民热情,使得内地对澳移民数量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每年仅 3 000 余人左右直线上升至新世纪初的近万人规模,至 2006—2007 年度已超 2 万人^⑨。移民潮之下,内地对澳投资移民数量亦由少而多,2000—2001 年度内地商业投资移民人口占澳商业投资移民人口比例尚仅为 7.9%^⑩,至 2007—2008 年度时已高达 52.9%,绝对数量更是达到 3 470 人之多;相形之下,香港已降至仅 130 人,台湾为 231 人^⑪,从而使得内地全面取代香港、台湾成为中国对澳投资移民的主要来源地,进而使得中国对澳投资移民潮进入前所未有的、以内地投资移民为主导的新阶段。

①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Parliamentary Debat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fficial Hansard, No. 163, Thursday, 3 November 1988:2454.

②The Hon. Philip Ruddock MP, Minister for Immigration and Multicultural Affairs, Business Migrants Investing in Australia, MPS 40/98, Canberra: 13 April, 1998.

③Jams Jupp, From White Australia to Woomera, The Story of Australia Immigration,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50.

④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Parliamentary Deb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fficial Hansard No. 179, 5 September 1991, p. 719.

⑤Philip Ruddock, MP, Minister for Immigration & Multicultural Affairs, Migration Program Outcomes for 1995–96, MPS 56/9626, Canberra: August 1996.

⑥Bob Birrell, “Immigration Policy in Australia”, in John Higley etc., Nations of Immigrants, Australia and the USA Compared,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p.82.

⑦世界银行各国人均 GDP(现价美元)统计数据[DB], 见 <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PCAP.CD>

⑧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 Multicultural and Indigenous, Consolidated Immigration 1999–20000,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02, p.30, p.32; Department of Home Affairs, Historical Migration Statistics,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18. 参见其中的 “The permanent migration program outcome by stream and citizenship, 1996–97 to 206–17” 数据模块。

⑨Department of Home Affairs, Australian Government, Historical Migration Statistics,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19. 参见其中的 “1.3 Settler arrivals, 1975–76 to 1994–95”、“1.4 Settler arrivals, 1995–96” 和 “2.1 Permanent additions, 1996–97 to 2007–08” 等数据模块。

⑩邵春芬:《中国精英移民澳大利亚:现状、影响和趋势》,载《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 161—162 页。

⑪Department of Home Affairs, Australia Government, Australian Migration Statistics, 2016–17,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18. 见其中的 “1.8 Skill stream—top 15 citizenship countries,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Investment visas, 2007–08 to 2016–17” 数据模块。

综上所述,经过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大约三十年左右的历史发展与变迁,中国对澳投资移民潮在 21 世纪初进入了以内地对澳投资移民为主的新阶段,这对于未来进一步推进中澳两国经贸交流与合作,有着十分特殊的标志性意义。

二、近十余年中国对澳投资移民的发展现状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对澳大利亚投资移民潮发展过程中,2008 年是重要时间节点。

这一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令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陷入资金不足、增长乏力、失业严重的困境。与其不同,中国通过拉动内需、升级产业结构、大规模供给侧改革及 4 万亿人民币基础设施投资计划等重大举措,非但稳定了经济增长,还取得了更加辉煌的成就。2010 年时中国 GDP 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相应地,人均 GDP 表现亦十分亮眼,据世界银行统计,1998 年至 2008 年中国人均 GDP 从 829 美元增长到 3 468 美元^①,十年间绝对增量尚仅为 2 640 美元;而到 2018 年时,人均 GDP 已在 2008 年基础上增长到 9 771 美元^②,十年间绝对增量高达 6 302 美元,是 1998 年至 2008 年这十年间人均 GDP 绝对增量的 2.4 倍。经济的飞速发展,人民财富的巨大增长,培育了数量庞大的新富阶层。据估计,2006 年时中国资产达 1 千万元人民币以上的高净值人士仅 18 万人,到 2018 年时已高达 197 万^③,年均增长率高达 82.9%。新富阶层人口的爆发性增长,进一步刺激了中国人对外投资移民的欲望。

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欧美各国纷纷提高投资移民门槛,谋求最大限度吸纳中国移民投资,刺激经济增长。澳大利亚亦于 2010 年进行了商业投资移民政策改革,将投资移民最低限额由 50 万澳元提升至 100 万澳元,且又于 2012 年 7 月 1 日和 2015 年 7 月 1 日分别实施了最低投资限额为 500 万澳元的“重大投资移民签证”(SIV)和最低限额为 1 500 万澳元的“卓越投资移民签证”(PIV)政策^④,以吸引主要来自中国的高净值人士。澳改革举措获得了很大成功。虽然因 2010 年投资门槛突升至 100 万澳元而导致澳投资移民申请数量一度下跌,从 2009—2010 年度的 26 345 份直降至 2013—2014 年度仅 14 560 份^⑤,但不久后澳投资移民申请总量又迅速回升,至 2016—2017 年度已增至 30 877 份^⑥;次年,即 2017—2018 年度,再增至 35 498 份^⑦的历史最高水平。澳海外投资移民申请总量出现如此巨大变化,主要原因便在于 2008 年之后中国社会新富阶层人口的大量增加及其对澳投资移民热情日益高涨。事实上,同一时期,中国(含内地、香港和台湾)年度对澳投资移民数量从 2007—2008 年度的 3 831 人,增加到 2012—2013 年度的 5 244 人,至 2017—2018 年度更达到 5 528 人的历史最高水平^⑧。十年之内,中国年度对澳投资移民人口增幅高达 44.3%,从而使得 2007—2008 年度以来在澳中国投资移民总量已累计高达约 5 万,远远超过改革开放以来至新世纪初期中国对澳投资移民总量。这意味着,与 2008 年以前的早期投资移民相比,近十余年中国对澳投资移民将发挥更重要的主体作用。

①②世界银行各国人均 GDP(现价美元)统计数据,见 <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PCAP.CD>

③招商银行、贝恩公司:《2019 中国私人财富报告》,第 3 页。

④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 Border Protection, Australian Government, Australia's Migration Trends 2013-14,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14, p.13;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 Border Protection, Australian Government, Australia's Migration Trends 2014-15,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16, p.10.

⑤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Border Protection, Australian Government, 2013-14 Migration Programme Report, Programme year to 30 June 2014, p.10. 当年度共处理投资移民申请 7 380 份,待处理投资移民申请 7 180 份,二者总合为 14 560 份。

⑥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Border Protection, Australian Government, 2016-17 Migration Programme Report, Programme year to 30 June 2017, p.10. 当年度共处理投资移民申请 15 781 份,待处理投资移民申请 15 096 份,二者总合为 30 877 份。

⑦Department of Home Affairs, Australian Government, 2017-18 Migration Program Report, Program year to 30 June 2018, p.13. 当年度共处理 16 816 份投资移民申请,且待处理移民申请为 18 682 份,二者总合为 35 498 份。

⑧见“表 1:中国对澳投资移民人口基本情况”。

不仅如此,伴随着中国社会新富阶层人口数量的持续增长,与早期对澳投资移民相比,近十余年中国对澳投资移民变化还体现在:

一是中国全面巩固了作为澳大利亚最主要的投资移民来源国的地位。随着中国对澳投资移民人口的持续增长,其占澳海外投资移民人口比例亦呈一路趋高态势:2007—2008年度,中国对澳投资移民人口占澳海外投资移民人口比例为58.4%,至2014—2015年度便已攀升至79.2%,达历史最高水平。之后数年,中国投资移民人口占比略有下滑,却也基本稳定在75%左右^①。可见,当前中国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最主要的投资移民来源地,对其吸引海外投资和高级管理人才,已产生了无可替代的主导性作用和影响。

表1 中国对澳投资移民人口基本情况

(单位:人;%)

	内地	香港	台湾	中国投资移民总量	澳海外投资移民总量	内地投资移民占中国投资移民比例	中国内地投资移民占澳海外投资移民比例	中国投资移民占澳海外投资移民比例
2006—2007	2 814	*	*	*	*	*	*	*
2007—2008	3 470	130	231	3 831	6 565	90.6%	52.9%	58.4%
2008—2009	4 393	80	120	4 593	7 397	95.6%	59.4%	62.1%
2009—2010	4 294	102	158	4 554	6 789	94.3%	63.2%	67.1%
2010—2011	4 791	126	130	5 047	7 796	94.9%	61.5%	64.7%
2011—2012	4 614	104	33	4 751	7 202	97.1%	64.1%	66.0%
2012—2013	5 058	145	41	5 244	7 010	96.5%	72.2%	74.8%
2013—2014	4 614	154	17	4 785	6 160	96.4%	74.9%	77.7%
2014—2015	4 870	214	52	5 136	6 484	94.8%	75.1%	79.2%
2015—2016	5 168	192	30	5 390	7 260	95.9%	71.2%	74.2%
2016—2017	5 131	217	51	5 399	7 260	95.0%	70.7%	74.4%
2017—2018	5 087	362	79	5 528	7 260	92.0%	70.1%	76.1%
2018—2019	5 209	303	*	*	7 261	*	71.7%	*
2019—2020	2 872	*	*	*	4 420	*	65.0%	*

资料来源: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 Citizenship, Country Profil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10;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 Citizenship, Country Profil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13;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 Border Protection, Country Profil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16; Department Homeaffairs, Australian Government, Australian Migration Statistics, 2017—18, April 2019, 见其中的“Table 1.8: Skill stream—top 15 citizenship countries,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Investment visas, 2008—09 to 2017—18”数据模块; Department Homeaffairs, Australian Government, Australia's Migration Trends 2018—19 Highlights,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19, pp.5—6; Department Homeaffairs, Australian Government, Australia's Migration Trends 2019—20 Highlights,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20, p.6.

二是内地投资移民成为中国对澳投资移民主导群体。新世纪初以来,中国对澳投资移民人口增长,主要来源于中国内地投资移民人口增长。2006—2007年度,内地对澳投资移民为2 814人,之后逐渐攀升至2015—2016年度的5 168人,随后两年亦保持在5 000人以上的高水平。在澳大利亚年度投资移民计划大多控制在7 000人左右的情况下,当前内地投资移民人口数量已基本处于历史最高位水平,而难有进一步增长^②。而与此同时,因香港、台湾两地对投资移民总量太少,且又稳中有降,这便导致内地投资移民人口占中国对澳投资移民人口比例进一步提升,从2007—2008年度的90.6%直增至2011—2012年度97.1%的历史最高点。之后,这一比例稍有回落,然大多数年份仍维持在95%以上^③。这意味着,当前中国对澳投资移

①见“表1:中国对澳投资移民人口基本情况”。

②事实上,中国内地投资移民人口占澳大利亚海外投资移民总人口比例一直保持在十分惊人的70%以上水平。见“表1:中国对澳投资移民人口基本情况”。

③2017—2018年度内地投资移民数量占中国对澳投资移民数量比例之所以下滑较多,主要是受当前中澳关系趋紧的影响,并不具备统计学上的意义。

民,本质上是中国内地对澳投资移民。

三是投资移民总体资金实力更为雄厚。近年来,由于澳大利亚投资移民资金门槛已升至 100 万澳元,使得能够顺利获得永久居留签证而移民者,大多为中国新富阶层,而普通中产人士较少。主要原因是,只有这批为数达 200 万左右且人均可投资资产高达 3 080 万元人民币的高净值人士^①,才真正拥有以投资方式实现移民的资本;而这对那些人数更为庞大、人均可投资资产却仅为约 134 万元人民币的新兴中产阶层^②而言,本质上还是十分艰难的。这便使得当前中国对澳投资移民整体经济实力远非 2008 金融危机之前可比。不仅如此,澳大利亚分别于 2012 年 7 月和 2015 年 7 月先后实施的“重大投资移民签证”(SIV)和“卓越投资移民签证”(PIV)政策,更是直接以吸引中国富豪投资移民为目标。因这两项签证皆无年龄、语言要求,且后者更无居澳年限要求,故而这两项签证实施后,便吸引了不少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富豪提出投资移民申请。例如,2014 年 7 月 1 日至 2015 年 7 月 1 日,澳移民部共收到了 1 544 份重大投资移民申请,其中 90%便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③,这更凸显了当前中国对澳投资移民整体经济实力之雄厚。

总之,近十年来由于中国(主要是内地)已成为澳大利亚投资移民主要来源地,对澳投资移民人口规模庞大,其投资移民整体财富实力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必然将对促进中国对澳经济合作交流,推动中澳关系长远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三、中国对澳投资移民变化原因、影响与意义

近十余年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繁荣与发展,培育了大量新兴富裕阶层人口,这是当前中国对外投资移民潮方兴未艾的客观基础;而大量新富阶层之所以选择以投资方式移民澳大利亚,使得中国(主要是内地)成为澳大利亚主要投资移民来源地,主要原因如下:

其一,澳大利亚自然环境和人居环境优越,对中国社会富裕阶层很有吸引力。据胡润研究院调查结果显示,促使中国新兴富裕阶层对外投资移民的主要因素并非经济或政治问题,而是教育质量、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医疗水平、社会福利等社会生活问题^④,这令其在考虑投资移民目的国时必然首选人居环境更加优越的西方发达国家。而澳大利亚地广人稀,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森林覆盖率较高、自然风光旖旎、气候宜人的东南沿海地区,其公共基础设施、医疗和公共卫生条件、社会福利保障水平、教育水平、国民素质都非常好,令其成为世界上人居环境最为优越的国家之一。2019 年《全球宜居指数报告》中全球宜居城市排行榜前十座城市中,澳大利亚坐拥墨尔本、悉尼、阿德莱德三城,分列第二、第三和第十位^⑤,其中墨尔本更是从 1990 年至 2006 年曾先后十次被国际人口行动组织评为“世界上最适合人类居住城市”^⑥。可见澳大利亚城市整体宜居性很高,十分契合中国新兴富裕阶层需求,对吸引其投资移民有着很强的竞争力。

表 2 新兴富裕阶层对外投资移民主要影响因素

(单位:百分比)

影响因素	比例	影响因素	比例	影响因素	比例
教育质量	83%	社会福利	36%	生意	9%
环境污染	69%	资产安全	28%	社会安全	9%
食品安全	57%	政治环境	21%	生育考虑	8%
医疗水平	38%	税务考虑	10%		

胡润百富:《2018 中国投资移民白皮书》,第 31 页

①招商银行、贝恩公司:《2019 中国私人财富报告》,第 3 页。

②福布斯中文版、宜信财富:《2015 中国大众富裕阶层财富白皮书》,第 7 页。

③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Federation Chamber Adjournment Migration Speech, Canberra: 4 February 2016.

④参见“表 2:新兴富裕阶层对外投资移民主要影响因素”。

⑤李莉:《2019 全球十大宜居城市》,《百科知识》2019 年第 31 期。

⑥雷泓霁:《墨尔本为何多次荣膺世界最宜居城市之首》,《资源与人居环境》2013 年第 9 期。

其二,中国内地对澳直接投资迅猛增长拉动对澳投资移民人口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地对澳直接投资一直很少,直至 2005 年其年度直接投资才达 3.2 亿美元,且主要属国有企业投资。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内地大量国有、民间资金趁机涌出国门,到欧美发达国家寻找投资机会,便使得当年中国对澳投资额暴增至 162 亿美元,增长约 9.53 倍^①。虽这之后,中国对澳投资迅速降温,然总体仍呈增长态势,且自 2011 年起直至 2017 年,中国年度对澳直接投资额一直维持在 100 亿美元上下,这与 2005 年相比,显然仍不可同日而语^②。而由于拥有澳大利亚永久居留资格更有利于在澳企业经营与管理,这便使得中国企业家一旦申请对澳直接投资成功,则往往同时申请投资移民身份,从而一定程度上推高了中国对澳投资移民申请成功率。事实上,新世纪初以来,随着中国对澳直接投资额的大幅增长,中国内地投资移民人口亦在不断增加,使得中国投资移民人口占澳海外移民人口比例从新世纪初不足一成,至 2008 年之前已约占五成;而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随着内地年度对澳直接投资数额进一步大幅攀升,其对澳投资移民人口占澳海外投资移民人口比例进一步攀升,至 2012 年以后已高达 7 成以上。可见,中国对澳直接投资增长与对澳投资移民人口的增长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关联。

表 3 中国对澳直接投资

(单位:百万美元)

年份	投资额	年份	投资额	年份	投资额	年份	投资额
2005	320	2009	8 549	2013	9 185	2017	10 008
2006	2 920	2010	3 916	2014	8 351	2018	6 243
2007	1 539	2011	9 401	2015	10 140	2019	2 362
2008	16 200	2012	10 105	2016	11 538	2020	1 000

资料来源:相关数据乃根据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KPMG)2013 年和 2020 年两份调查报告综合而成,详见 KPMG, Demystifying Chinese Investment in Australia, June 2020, p.7; KPMG, Demystifying Chinese Investment in Australia, March 2013, p.2.

其三,中国赴澳留学生潮助推了投资移民人口增长。长期以来,由于优质教育资源稀缺,以及中国家庭对子女教育极为重视,为了能够规避日益激烈的教育竞争压力,而又可享受到更好的教育资源,接受更好的教育,一部分经济条件较为优越的家庭往往选择将子女送往欧美发达国家留学。这种情况在中国高净值人群中表现更突出。据调查,83%中国高净值人群之所以会选择投资移民,其主要动机之一便是因为西方发达国家整体教育质量较高^③。而作为西方发达国家重要成员,澳大利亚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水平位于世界前列^④,其留学生教育产业在国际社会享有很高声誉,为世界第三大留学生接收国^⑤,故而其一向比较受中国家长青睐,使得近些年来中国赴澳留学生数量一路走高,尤其从 2013 年至 2018 年的六年时间里,在澳留学人数从 13.9 万人迅速增至 25.5 万人^⑥,短短六年时间数量增长了 84%。而伴随着大量中国学生留学澳大利亚,一部分经济条件优越的家庭为了照顾子女生活、监督其学业,便申请投资移民,从而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中国对澳投资移民人口的增长。

此外,作为一股绵延不绝的跨国人口迁移风潮,大量中国社会富裕阶层之所以热衷于对澳投资移民,亦

①②参见“表 3:中国对澳直接投资”。

③胡润百富:《2018 中国投资移民白皮书》,第 31 页。

④根据 QS、USNEWS 等世界大学排行榜,澳大利亚的大学绝大多数可进入全球 300 名以内。

⑤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在 2016 年全球前十大接收高等教育留学生目的国中,虽然从学生总量来看,当年度美国依旧以录取 971 417 人的傲人成绩高居第一;英国位列第二,累计录取了 432 001 人;之后为澳大利亚,共计吸纳了 335 512 人。但就大学招收留学生的增长幅度而言,澳大利亚国际排名第一,较之上一年增幅 14%;而美国的增幅仅为 7%;英国已近停滞。资料来源: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ustralian government, Research snapshots, Global student mobility— destinations and origins, accessed on 4 January, 2020.见澳大利亚教育部官网(<https://internationaleducation.gov.au>)。

⑥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ustralian Government, International student data, accessed on 6 August, 2019.

同澳大利亚更为完善的法治社会建设、更为开放包容的文化与制度环境、更加国际化的金融与投资环境等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在一系列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近年来中国对澳投资移民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这对促进中国对澳经济合作交流,推动中澳关系长远发展,影响较为深远:

第一,为推动南太平洋地区“一带一路”建设和在澳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重要依托力量。全球“一带一路”建设能否顺利推进,本质上“人”的因素最为关键。如前述,仅2007—2008年度至今在澳中国投资移民人口已高达约5万人,且每年仍以5000人左右的规模涌入澳大利亚,长此以往,这实质上为南太平洋地区“一带一路”建设和推动在澳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巨大的、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保障。事实上,与一般技术移民不同,投资移民群体大多拥有丰富的资本以及丰富的企业经营管理和金融投资经验,这使得他们有条件、有能力为促进澳大利亚经济繁荣、科技进步、产业发展、企业管理模式创新与社会就业等发挥重要作用、做出重要贡献,从而获得广泛社会影响,赢得主流社会信任与尊重,进而在促进中澳沟通与对话,推动澳大利亚主流社会接纳、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成为南太平洋地区“一带一路”建设的可靠依托与战略需求的潜在对接者。

第二,塑造了华人族群新形象,有助于改善和提升澳主流社会对中国的认知。殖民地时代以来,澳大利亚华人移民大多为底层劳工移民,主要从事低技能职业或纯体力劳动,且备受歧视。20世纪80年代以降,拥有良好教育背景和英语能力的专业技术人才成为对澳移民主流,然因其绝大多数仍属普通工薪阶层,不得不在异国他乡为生存而奋斗,且大多集中于餐饮、零售、建筑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仍然很难改变在澳华人胼手胝足、艰苦朴素的社会底层形象。而近年来大量投资移民的到来,迅速改变了这一状况。由于自2008—2009年度以来中国对澳投资移民人口便已超过澳投资移民总人口的一半以上,至2012年以后更是占据了74%以上的超高比例,而同一时期其他国家对澳投资移民又十分弱势,如2017—2018年度排名第二、第三、第四位的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投资移民人口仅分别占澳投资移民人口比例的5.9%、4.7%和1.1%^①,相比之下,华人经济社会地位便显得十分突出,令其成为备受主流社会瞩目的少数移民族群,从而塑造了在澳华人“从事管理、商务或技术工作,积极融入国际化和全球化潮流的富有和高品位的形象”。从这个角度上说,有学者认为“中国投资移民正在创造着中国海外移民的新形象。”^②而这必然有助于改善和提升澳主流社会对中国形象的整体认知水平,并促进民间交往与合作的发展。

第三,促进了中国对澳资本融通。当前中国每年对澳投资移民始终保持历史高位水平,这意味着,即便以对澳最低投资移民限额100万澳元计算,那么每年对澳投资数量亦十分可观。以2014—2015年度为例,当年度澳大利亚对中国签发了5136份投资移民签证,则当年度中国移民对澳投资总额便高达51.36亿澳元。然而,这些投资移民申请中,尚有一部分投资金额最低高达500万澳元以上的高端投资移民获批,为数532份^③,其对澳投资总金额高达26.6亿澳元。故而,仅该年度中国对澳投资移民便为澳大利亚带来了至少70亿澳元的资本。2015年7月1日澳大利亚实施“卓越投资移民签证”政策之后,随着最低投资金额高达1500万澳元的超高端投资移民的到来,中国投资移民为澳大利亚带来的直接资金流入必然更高。年复一年,周而复始,本质上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资本对澳大规模流动与融通现状的形成。

第四,拓展和深化了中澳经济与社会联系。近年来大量中国新富阶层以投资方式移民澳大利亚,只是导致其工作和生活空间发生了变化,却不会令其斩断与祖国的社会关系以及经济联系,相反,作为第一代对澳投资移民,为了自身商业管理与投资事业发展,他们往往十分重视维护其国内人脉关系与商业联系。

^①Department of Home Affairs, Australian Government, Australian Migration Statistics, 2017—18, April 2019. 参见其中的“Table 1.8: Skill stream—top 15 citizenship countries,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Investment visas, 2008—09 to 2017—18”数据模块。

^②宋全成:《论中国投资移民的积极意义》,载《社会科学辑刊》2014年第5期。

^③Senate Legal & Constitutional Affairs Legislation Committee, Estimate, Canberra: 24 March, 2017, p.59.

事实上,迫于澳大利亚人口较少,市场相对狭窄,许多移民澳大利亚的华人大多仍然从事与中国相关的产业经营与贸易,比如面向中国市场开发澳大利亚房地产,从事华人旅游、电子商务、物流服务,进行葡萄酒、保健品、绿色食品、深海产品等加工、生产、投资与销售等,不一而足。这便不仅需要继续维护、加强与国内的商业合作关系与销售渠道,还有必要拓展更为广泛的人脉资源,搭建更好的发展平台。为此,大量在澳经商的华人成立了数量庞大、名目繁多的华商社团^①,试图通过共建商业合作平台,更好地实现与国内市场对接,共同寻找商机,推动中澳双方更大范围、更大力度的合作与发展。也就是在这种合作与互动过程中,从2007—2008年度至2017—2018年度这十年间,澳大利亚对华出口商数量从4495家增长到7779家,增长了73%;对华交易次数从84385次增加到294475次,增加了2.5倍;对华出口总值从27034百万澳元增长到105630百万澳元,增长了约2.9倍^②。可见,近些年中澳经贸关系突飞猛进发展,与中国对澳投资移民人口的大幅增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四、中国对澳投资移民面临的挑战及发展趋势

近年来,中国对澳投资移民总体水平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然其未来发展前景却令人忧虑,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中澳关系持续走低,澳大利亚主流社会质疑华人的政治忠诚。近年来,中国崛起引发了亚太地缘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这严重刺激了澳大利亚的政治神经,使其对自身地缘政治安全不确定感越发强烈。为了保护其所谓“国家安全”,澳右翼势力极力妖魔化中国,并将涉华议题“政治化”,以达到反对以华人为代表的亚洲移民的目的。2017年澳大利亚《先驱太阳报》发文暗示华裔富商黄向墨是中国政府间谍,率先将在澳华商“标签化”“脸谱化”为中国利益代理人,从而引发了一股绵延至今的反华浪潮;而2018年反华学者Clive Hamilton的《无声入侵》一书宣称中国政府正通过包括利用华文媒体、华人社团、留学生组织等各种手段影响着澳政要、高等学府、智库和媒体,则将反华风暴迅速推向高潮。在全社会反华声浪此起彼伏的背景下,为了防止所谓“中国渗透”,澳大利亚一方面加强对中国的投资审查,叫停华为海洋网络有限公司在澳铺设海底光缆项目(2017年)、禁止中国国家电网竞标新南威尔士州电网输送项目(2018年),并无限期拖延其“北部大开发”计划对接“一带一路”等;另一方又于2018年6月通过两项反间谍法案,即“国家安全立法修正案(间谍活动及外国干预)法案”,以及“外国影响力透明化法案”,以防范所谓中国间谍与情报策反活动。可见,在中澳关系趋紧的状态下,澳大利亚政府和主流社会对华人充满了疑忌和不信任。在全社会处于反华亢奋状态之下,中国对澳年度移民人口数量长期居高不下(约3万左右),其对澳投资移民长期占澳全部投资移民比例更高达70%以上,且500万澳元以上的重大投资移民90%皆为中国移民,这必然会引发澳主流社会担心中国影响力将伴随大量中国移民及其资本渗透入澳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何况,近年来高达70%左右的中国人移民澳大利亚后,仅满足于持有绿卡,却不愿入籍,更强化了澳主流社会的疑忌心理,怀疑中国人移民澳大利亚,掺杂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质疑其政治忠诚。

①如以北京总商会、上海总商会、江苏总商会、广东总商会、浙江总商会、南京总商会、深圳总商会等为代表的以中国行政区划命名的华商社团;或以澳大利亚中国工商业委员会、南澳大利亚中华总商会、澳大利亚维州中华总商会等为代表的以澳大利亚行政区划为命名的华商社团;或是以澳大利亚针灸中医协会、澳大利亚维省中华西医协会、澳中文化科技促进会、澳大利亚华人金融专家协会等为代表的行业性华商社团等。

②相关系列数据可查阅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haracteristics of Australian Exporters, 2010-11,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12;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haracteristics of Australian Exporters, 2012-13,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14;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haracteristics of Australian Exporters, 2016-17,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18;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haracteristics of Australian Exporters, 2017-18,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19.

其次,澳主流社会质疑引进华人投资移民的价值和意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澳主流社会便对投资移民寄予厚望,希望能够依托其资金、技术和管理推动澳大利亚产业升级转型,并与亚洲市场建立紧密联系,尤其2012年7月重大投资移民签证政策出台后,更认为其必将“使得澳本土技术和创新部门可以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建立友好联系,……促进我们创业人才基地的成长,并使得我们的创新产业昂首阔步迈进21世纪。”^①然而,事与愿违,作为澳大利亚最大的海外投资移民群体,来自中国的华人投资移民在获得永久居留资格之后,却往往不愿意轻易放弃更为广阔的中国市场,而大多选择继续经营原有国内产业,而较少有人完全立足于澳大利亚市场开展企业经营。这便引发了近些年来越来越普遍的中国对澳投资移民“移民不移居”现象^②,即许多投资移民仅满足于获得永久居留身份,而并不实际居住澳大利亚,更不会在澳大利亚发展个人事业。对这一普遍存在的现象,早在2010年的一份调查报告中,澳政府便认识到,中国人以投资方式移民澳大利亚的主要动机在于让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以及不愿意被束缚在某一个地方居住,从而改善其家庭生活品质^③,而不是创业或拓展其生意,这使得大多数人在获得永久居留权后,并不一定会将事业重心放在澳大利亚^④。澳普通民众的看法则更直接:“很多中国的商业投资移民申请人……拿到身份后,便回到中国。挣着中国的钱,拿着澳大利亚的身份,去香港消费。”^⑤如此一来,华人投资移民便根本无法真正促进澳大利亚商品和服务出口、为其引进新技术或进行技术改良、拓展其与国际市场的联系,令其对澳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明显不足。事实上,据澳官方调查,以中国移民为代表的大多数投资移民从事的都是缺乏更高技术含量的零售业或酒店业;其生意规模普遍不大,雇佣员工数量低于4人者比例高达93%,这甚至比2010年时澳大利亚全国小微型企业比例(84%)还要高得多^⑥。既然占海外投资移民总量绝大多数的中国投资移民无法实现澳设立商业投资移民签证的初衷,这令其主流社会反对投资移民的声音逐渐高亢起来,尤其保守派官方智库生产力委员甚至宣称,几乎没有任何证据可证明,与普通技术移民人口相比,商业投资移民对澳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大或更小^⑦,意即继续保留该种类签证已无多大意义。

在澳大利亚主流社会看来,既然华人投资移民政治上不可靠,又不能为澳大利亚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更大贡献,那么限制中国对澳投资移民,减少澳大利亚对中国投资移民的依赖,便几乎成为题中应有之义。2015—2016年度,澳政府批准中国内地投资移民申请的数量在上一年度基础上增加了6.1%,达到5168人的历史最高点,然中国投资移民人数占当年度澳海外投资移民总数比例却降至71.2%,较前一年度下降了近4个百分点;2017—2018年度,澳政府批准中国投资移民申请数降至5087人,令其占澳海外投资移民总数比例进一步降至70.07%。虽则2018—2019年度中国内地投资移民申请获批人数占澳海外投资移民总数比例暂时回升至71.7%,却旋即于次年度,即2019—2020年度又暴跌至64.9%,令其在澳海外投资移民人口中所占比重进一步下滑,且中国内地投资移民人口绝对数仅为区区2872人^⑧,这与之前数年平均高达

①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Parliamentary Debate, The Senate Questions without Notice, Trade Question, Tuesday, 1 December 2015.

②个别学者亦将这种现象称作“假投资、真移民”,即很多中国富裕人群对他国投资的目的仅在于获得移民身份,而不在于投资的收益率,在获得投资移民身份后,往往不会再追加投资;且在获得投资移民身份后,亦往往不实际居住在移民目的国,而是继续居留国内发展事业。参阅陈敏:《中国新移民改变世界》,《环球企业家》2012年第16期;宋全成:《理性看待中国民营企业投资移民》,载《中国当政干部论坛》2013年第5期。

③DIIRD, Business Migration Review Research Project Scope, 15 July 2010.

④Productivity Commission Draft Report, Migrant Intake into Australia,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15:348.

⑤邵春芬:《中国精英移民澳大利亚:现状、影响和趋势》,载王辉耀主编:《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70页。

⑥Productivity Commission Draft Report, Migrant Intake into Australia,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15, p.349, p.347.

⑦Productivity Commission Draft Report, Migrant Intake into Australia,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15, p.348.

⑧Data Division Department of Home Affairs, Australia's Migration Trends,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20, p.6.

5 000 人左右的投资移民数量相比,相去甚远。由此可见,澳大利亚限制中国投资移民的意图已比较明显,未来中国对澳投资移民整体发展趋势已很难回到数年前的巅峰状态而必然进一步走弱。

结 语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中国内地对澳投资移民从无到有,逐渐取代香港和台湾,成为澳大利亚主要投资移民来源地,这不仅直观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地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亦从一个重要侧面展示了中国主动拥抱全球化的积极姿态,以及要求全面加强与世界各国交流与合作的美好愿望。而近十余年更趋强劲的中国对澳投资移民潮,则更是从客观上为加强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联系与交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巨大便利与优势,大量华人以投资方式移民澳洲,对于重塑华人族群新形象,拓展和深化澳主流社会对中国的了解与认知,促进中国对澳资本融通和民心相通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为引导澳主流社会接纳、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减少南太平洋地区“一带一路”建设阻力奠定了重要基础。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抛弃以往那种认为移民意味着“人才流失”的传统保守观念,以更加包容、开放姿态接纳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对外投资移民潮的出现,乃至积极鼓励、推动对外投资移民^①,意义重大。而至于如何评估当前诸如中国对澳投资移民中出现的类似问题与挑战,以及采取何种解决方案,那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责任编辑:黄世棉)

Chinese Investment Immigration to Australia: History, Status Quo and Its Development Trend

Yan Ting

(Australia Research Center/Overseas Chinese Research Center,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Jiangsu 221116)

Abstract: Investment immigration from China to Australia started from the end of 1970s. Till the middle of 1990s, business investment immigration from HK and Taiwan area were the main part. With the continuously deepening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quick development of economy in China's mainland, investment immigration from China's mainland to Australia gradually became the mainstream from the middle of 1990s to the beginning of new century. Particularly in recent ten years new rich class emerges in China's mainland. This consolidates the leading position of investment immigration from China's mainland in all investment immigration to Australia. This has profound impact on promoting the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Australia and further development of Sino-Australian relationship. While, because of the skepticism from mainstream society in Australia on overseas Chinese's political loyalty, and the denial of economic value and meaning of investment immigration to Australia,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investment immigration from China to Australia is not so positive.

Key words: China; Australia; Investment Immigration

^①鼓励投资移民,并不意味着要求移民者加入居在国国籍。